



田中阳 主编

现代化与中国传播研究丛书

中国传媒法制的 变革空间

——以现代化理论与模式为视域

肖燕雄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本书从法学理论出发，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了传媒法制的变革空间。作者认为，传媒法制建设应立足于中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法制体系。本书从法学理论出发，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了传媒法制的变革空间。作者认为，传媒法制建设应立足于中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法制体系。





田中阳 主编

现代化与中国传播研究丛书

中国传媒法制的 变革空间

——以现代化理论与模式为视域

肖燕雄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媒法制的变革空间：以现代化理论与模式为视域

肖燕雄著.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11

(现代化与中国传播研究丛书/III 中阳主编)

ISBN 7-5355-5017-7

I. 中... II. 肖... III. 传播媒介—法制史—中国 IV.D92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19227号

现代化与中国传播研究丛书

中国传媒法制的变革空间

——以现代化理论与模式为视域

著 者：肖燕雄 著

责任编辑：符本清 舒 歌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邮 编：410007

电子邮箱：postmaster@hneph.com

网 址：http://www.hneph.com

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6开

印 张：18.5

字 数：290000

ISBN 7-5355-5017-7/G·5012

定 价：28.00元

印 刷：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万福工业区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肖燕雄 1965年生，湖南新宁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专业博士。1986年大学毕业后即从事新闻学教学工作。出版《新闻传播制度研究》等学术专著2部，主编或参加编写教材6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发表文学作品、新闻作品多篇。正在主讲研究生、本科生课程4门。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制度，传播法制与伦理，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史，记者形象等。曾获全国性学术论文奖和校级教育教学奖。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6项。

责任编辑 符本清
舒 歌
装帧设计 肖 敏



主 编 导 言

2002年3月，我主编的《传播研究丛书》由岳麓书社出版，至今已4年多了。在那套丛书“主编导言”中，我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编写这套丛书，只是一种艰难的尝试，一种学术跋涉的起程，尽管还不成熟，还不到位，然而学术的原创性则是我们所强调的，本土化则是我们所追求的。我和我的同仁将会一如既往地为中国传播研究作不懈的努力，拿出更厚实的成果，作出更大的贡献。”现在，这套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现代化与中国传播研究》丛书，说明我和同仁们没有食言，在继续努力，并有了明显的学术提升。

我们研究传播学并把它正式设置为本科课程是1996年。那年文学院成立新闻系，任命我为系主任。在作了一些比较深入的调研并阅读了许多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书籍后，我决定在新闻系开出传播学的选修课。

那时从事新闻教学的某些教师，囿于原来的报学、甚至是极左的新闻价值观，视野褊狭，理论空间混沌不清，连新闻的第一性是不是真实性都不敢讲，讲也讲不明白。从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年间，新闻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为极左思潮的工具，成为“假大空”的传媒。20年的影响已经形成“习惯”，形成“传统”，形成强大的历史惯性力。新时期的新闻教学和研究本应当用科学的新闻价值观去遏制和消除这种历史惯性力，使新闻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而不是沿用一些错误的理论价值观念，为这种历史惯性力的延续继续鼓吹。

其实,了解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新闻界反“客里空”运动就能对“真实性”问题作出明确判断。在这场运动的前前后后,党的领导人发表过许多指导性意见,如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刘少奇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以及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等,都是党的新闻史上经典的新闻理论文献。毛泽东的“谈话”尽管没有直接谈到新闻的真实性问题,但他强调的“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等观点,也是对新闻真实性内涵的揭示。刘少奇的“谈话”明确反对“客里空”,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他说,“搞‘客里空’是会受处罚的”。他强调说:“你们的报道一定要真实,不要添油加醋,不要戴有色墨镜。群众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唯物论者是有勇气的,绝不要添加什么,绝不要带着成见下乡。”而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所强调的“基本观点”,即是新闻的第一性是真实性的观点、新闻的本源是客观事实的观点。他说:“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他还认为:“政治性比起那包含这种政治性的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他说把这两者“头足倒置颠倒过来”,“立即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开了大门。既然‘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闻,那么,政治性的造谣、曲解、吹牛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闻的资格了么?德意日法西斯‘新闻事业’专靠造谣吹牛吃饭,不靠报道事实吃饭,岂不也振振有辞,有存在的资格了么?”他甚至说:“凡是不尊重事实的,哪怕装得很革命,实际上一定是反动的家伙。”解放区新闻界的反“客里空”运动,实质上就是坚持新闻真实性的运动,就是坚持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性、是新闻的根本属性的运动。当时的党报纷纷发表言论,捍卫党的新闻真实性原则。如《解放日报》1945年3月23日发表题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社论,强调“要建立新闻事业对社会对人类完全诚实完全负责的风气,对党对人民完全诚实完全

负责的风气”。

在我看来，一门学问总有它的立足之基。比如文学必须用形象说话，形象思维就成为文学的本质性特征，成为它的立足之基。真实性和时效性则是新闻的立足之基。新闻之所以为新闻，就因为有这两个支撑点。传媒工具的革新和革命，是使新闻如何更真实、更快捷；新闻记者的素养高低，最重要的也是看他的报道的真实度和快捷度；新闻理论的基点也在这里，离开这两个支撑点去谈新闻的价值，是缺乏逻辑前提的空谈妄说。我们特别强调对新闻的理解。我们说的“理解”，是对一名从事新闻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比较高的要求。一名新闻学科的教师只能照本宣科，只能讲讲“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之类的“新闻学”、“新闻理论”，他离新闻实质上还很远。就像生活中只是认识一个人，并没有成为“朋友”，更没有成为“知音”、“知己”。理解新闻一定要理解历史，理解文化，理解社会大传播系统的传导规律。新闻与文学不同。文学是一门艺术，它的本质是审美的，它有超越时空的魅力，一首唐诗、宋词可以世代传诵下去，一部《红楼梦》也可以世代读下去，读者不一定去探讨它们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也能产生审美效应；但新闻的本质是历史的，它要求本真和质朴，它不能离开历史，它是历史的日记，离开历史，就不知这新闻的价值在哪里，甚至离开那一天的“历史”、那一天的报纸版面，都难以估量这新闻的价值。一篇再好的新闻，如果离开历史来看，你会觉得平淡无奇，甚至味同嚼蜡。读不懂历史，就读不透新闻，新闻只有在它和历史的关系中，历史如何作用于它、它如何作用于历史的关系中才能体现它的魅力，它的亮色，它的影响力与价值。以前我们的新闻教学与研究总显得有些平面化，显得“无学”，根由之一就在这里。而我们对真实性和时效性的强调，也是基于新闻与历史的这种不解的关系。

我们认为应当有新的理论话语引入，才能改变新闻学科这种缺乏理论话语权的平面而乏力的格局。只用传统的“报学”、“新闻学”是难以认识社会大传播系统的信息传导规律的，是难以认识新媒体的新闻规律的，也是难以认识报纸本身除新闻之外的其他信息传导规律的，也是难以认识新闻与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互应的关系的。我们认为传播学的引入可以解决一

些问题。传播学的系统观点,使我们能够建立起社会大传播系统的观念,把包括新闻在内的社会信息传播与历史、文化建立起一种互动互应的结构观念、系统观念;传播学的信息概念,使我们能够认识新闻作为一种信息所应遵循的规律,也使我们能够言说新闻之外的媒体信息的传导规律;传播学的控制理论,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历史上信息失控而导致社会失控的悲剧根由,从而认识到“反馈”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传播学的受众观,使我们认识到受众在信息传播系统中的地位,从而根治中国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给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传播学的效果观,使我们能够高度关注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传播的效果和如何产生效果的问题,从而根治只传而不论其效果的中国信息传播的通病;传播学运用的抽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控制实验法等也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一是能应用它们更加科学地研究中国传播的规律,再则是它们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是传播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外,传播学对人类社会信息传播规律的普遍性认识,能够匡正中国新闻传播中意识形态化的偏颇,减少一些“短期行为”,更多地关注“长期效应”和整体效应,等等。比如真实性和时效性问题,用传播学的理论似可以说得更到位一些。传播的第一功能是监测社会,施拉姆比喻为“社会的雷达”。那么雷达的监测一是要准确,二是要迅速。比如说一只猛虎朝我们扑来了(如孔子说的“苛政”),新闻报道说来的是一只山羊,那么就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大跃进”、人口问题、环保问题、“非典”,等等);“猛虎”离我们只有100米了,新闻报道没及时报道,说不要着急,还有五里十里呢,结果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猝不及防的来临,等等)。这就是对新闻真实性和时效性的传播学学理阐释。只是囿于“政治”,就难以表述。引进传播学的理论话语,表达得更清楚些,更学术化一些,理论空间能更廓清一些。这虽然是传播学的A、B、C,但A、B、C常常是最基本的东西,能够破解一些最基本的疑团,从而疏通我们的学术思路。

对传播学的学习和研究,在我们这个学术团队就是这样起步的。1998年它正式列入了我们的教学计划,成为一门必修课。老师们开始认真地研读传播学著作,学会用传播学来指导

教学和研究。2001年，正式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我被任命为院长。在筹划学院的发展时，学术方向的确立是重头，我们经过认真的思考，都认为应该确立一个有比较大的研究空间、贴合中国本土实际、依托“电视湘军”和“出版湘军”的优势、依托我校自1938年“国师”成立以来所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雄厚的学术底蕴、并讲求“经世致用”的学术方向，要讲整合性，讲“拳头效应”。2002年3月出版的《传播研究丛书》是这时期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本土化”的研究成为共同取向。在那套丛书的“主编导言”中我写道：“照我的理解，传播学研究人类传播规律犹如生物学、医学研究人和动物的神经系统及其传导规律一样，它的重要性非同一般。社会如人体，没有一个传导灵敏、准确的神经系统，它就会失去其整体功能，导致‘偏瘫’、‘截瘫’和‘全瘫’，使系统紊乱、僵化和崩毁。因而，传播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必备条件，更是人类社会存活的前提。中国社会尤其呼唤传播学，因为社会机制的某些不合理及几千年封建文化（尤其是官本位文化）的深重积淀，传播不畅、不准，‘假大空’绵延不绝，导致经常性的‘失控’，这与‘现代化’显然是格格不入的，需要诊断‘病根’，寻找‘病情’，探讨在中国文化场中特有的传播规律。经济一体化，传播全球化，世界一体化已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中国若想不被开除‘球籍’，只有与时俱进。基于这样的学术理念，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心，应该在对传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传播研究本土化的问题作深入探讨。”“导言”还写道：“人类传播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尤其是文化心理、文化精神的沟通，更是一种带着民族性、区域性规约的深层次的传播。异质文化的传播必然存在不适应，不和谐。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整合性，一个民族或区域的特定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心理积淀、生活模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语言特点等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文化磁场，这是非常稳固、保守且排异性相当强的‘场’。‘全盘西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幼稚的主张。本土现实文化始终是一个社会文化环境的中心或内核，而传统文化则早已渗透到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成为其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接纳外来文化的母体。故异质文化要进入某个民族的文化

场，必须接受‘改造’，使之能与这个文化场相融合。这就是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它一方面消化了外来文化，改造了本民族文化，使本民族的文化获得新的特质，获得新的生命力，另外一方面它也可能将外来文化中的精华扭曲变形，使其面目全非。但不管怎样，没有这个过程，外来文化是不可能扎根的，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结论是：“决定传播学在中国发展命运的最根本性的问题还是本土化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传播学有效地为中国社会服务”，“应从中国社会、尤其是从我们的民族文化出发，去总结中国特有的传播规律，建立中国的传播学。”这是我们这个学术团队的一种共识，一种学术的宣言，也是建构那套丛书学术空间的核心价值观念。2003年，我们获得传播学硕士点，继而，又获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2003年，我以“现代化历史进程与百年中国传播”为题，作为自选项目，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获准立项。这个课题的研究思路实质上是对“本土化”研究的一种完善和提升，是一种拓展性的延伸。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研究中国传播的本土化规律，当是中国传播学的首要任务，也是根本性任务；此课题则以“现代化”这一关键词作为考量标准，而以“本土化”这一关键词作为研究的逻辑原点，既探讨“现代化”对百年中国传播发展的影响，又不离开民族文化的母体和接收屏幕去审视和研究这种影响；它以20世纪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与中国传播发展的互动互应关系作为基本的研究标的。它在20世纪百年时间跨度上研究中国传播发展的规律，而20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末世的近代到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时期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由一个以农为本的传统的封建社会走向以工商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的民主社会的历史过程，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上来研究现代化历史进程与传播发展的互动互应关系，对于了解传播发展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键性作用，对于认识中国传播现代化的自新过程及中国现代化与传播发展互动互应关系的某些规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此课题旨在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在这种背景上发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嬗演中去展开研究，而贯串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文化运行的主线是传统和现代、

中和西的文化冲突及融合与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化的嬗变。20 世纪中国传播一方面需进行现代化的革新，一方面需进行本土化的吸纳，现代化和本土化是中国文化向现代运演提升的两轮两翼，也是中国传播向现代运演提升的两轮两翼。因此，研究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与传播发展的互动互应关系，也是研究中国传播本土化的问题。而且只有与现代化对应起来考察，对中国传播的本土化研究才有坐标，才有深度，才有制高点，才可能进行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也同时才真正具有民族意义和本土特色的传播研究。传播学的本土化是现代化的本土化，传播学的现代化是本土化的现代化。这种表述，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以此课题为龙头，我们又进入了“现代化与中国传播”的比较系统的研究。

三年多过去了，经过我们努力拼搏，终于推出了这套丛书。与 2002 年出版的《传播研究丛书》比较起来，这无疑是一个新的进展，它是在艰难的学术跋涉长途中的一个标志性成果。这套丛书除了体现上述的学术理念之外，在研究的方式方法上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首先，是把中国的传播放置在百年中国历史文化环境中来研究，甚至放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和 20 世纪世界发展大趋势的背景下来研究，探析它的历史本质与文化底蕴。拙著《蜕变的尴尬——对百年中国现代化与报刊话语嬗演关系的研究》，在 20 世纪百年时间跨度上研究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与报刊话语互动互应的嬗演关系。“现代化”与“话语”是其两个主要视角，它们的交叉互动，构成其研究视域。现代化，简单地说来，就是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从根本上说，现代化理论是一种有关社会发展的学说。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始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从这一历史时期开始，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传统社会逐渐发生质的变化。从 1840 年至今，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 160 余年时间。中国的现代化由于特有的历史背景、国情的制约，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独特的内涵和独特的方式。中国的传统太久远，积淀太深厚，中国近代以来经历的现代化实践所依凭的内外环境太艰难，这就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注定千曲百折，注定步履维艰。中国的现代化在一种十分被动的历史境况中发轫，与

英、法、德、美等先行启动现代化的国家相比,已经落后很远,因而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状况中。这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农业文明形成的强大的皇权和顽固的农本思想与现代文明的不相容所致。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在双重困境的夹击下艰难前行的。由这个视角分析、研究百年报刊话语言说“历史”、又被“历史”言说的嬗演过程,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显现20世纪中国报刊发展历史的本质内涵和时代品性。话语理论则是一项了不起的科学发现。什么叫话语?专家们下了许多定义,总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我理解话语,认为它是一种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的语言,是一种具有支配意愿的、显示权力意志的语言。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曾引起我思想的震撼,我敬佩他的智慧和眼光。福柯的书难读,但透过那些曲里拐弯的表述,他的观点就还是回到“知识就是权力”这句话,他对话语权的阐释,也是我们破解历史的一个新的豁口。新闻是一种话语,也是一种权力,传播是一种话语关系,也是一种权力关系。由此角度来看20世纪的报刊话语与历史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就似乎变得更加微妙起来,感觉到它的深度和错综复杂性。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主航道上,它劈波斩浪,兴风作浪,成为这主航道重要的汇流。读巴赫金、福柯及其他话语理论大家的著作,再去读百年中国的报刊,那些尘封的铅字就都变成了无数飞扬的“喉舌”的声音,形成无数话语的争相表达,成了“喉舌”的争夺的阵地,那些尘封的铅字实际上曾是过去历史舞台各种“喉舌”的声音的活化石。20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五光十色的声音就是它们发出来的,没有声音的历史舞台是不可能存在的,有如此多的“喉舌”发声的20世纪中国历史舞台,正是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中国社会的典型表征。蔡骥教授的著作《百年广播电视与传播研究——一项跨学科的探索》,也是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立论的。该著作通过技术视野和社会文化视野,系统梳理了广播电视在过去百年中的发展历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广播电视的传播实践所促成的传播学各种理论的发展;并从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跨学科的视角对电视进行了多方位的深入探讨。肖燕雄教授的著作《中国传媒法制的

变革空间——以现代化理论与模式为视域》的主体部分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与答辩中获得优等。该著作认为：我国传媒法制变革的现代化模式应该是“内突”和“外发”相结合、并以本土资源为绝对主流的混合模式；而在其“内突”过程中，理论和实践证明，应对其“政治”变革空间的狭窄性以至不可能性有所体察和体谅。缘于此，该著作将传媒法制的变革集中放在经济、科技、文化、社会事件四个领域里进行讨论，认为四者为我国传媒法制的变革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该著作特别注重从伦理文化视角立论。在文化领域，作者也讨论了我国新闻诉讼判例对于传媒法制变革的借鉴意义。王文利博士的著作《近现代新闻图像研究——对中国现代化与新闻互动关系一个侧面的审视》，则对近现代新闻图像传播与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系进行研究，也有着十分独到的学术建树。

其次，追求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也是该丛书突出的特点。这一点在逻辑关系上是承上一点来的。因为把传播放置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研究，就必然形成多学科的综合视角，就必然形成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这其实正是学科边缘性极为突出的传播学的“个性”与“风格”。

经过10年的“求索”，我们对此有了十分清晰的认识，并且有了非常明确的学术定位和行进的学术向度。我、蔡骥、肖燕雄、龚维忠、周国清、周庆元、胡宏文等院本部教授的研究，构成了现代传播史论、传播与文化、传播与社会发展、书刊传播等明晰的学术方向。蔡骥博士有4部专著，1部译著，核心期刊论文50余篇；肖燕雄博士有2部专著，核心期刊论文30余篇；我有4部专著，主编《传播研究丛书》，主编《大众传播学理论》，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龚维忠教授有专著2部，核心期刊论文30余篇，等等。

我们还整合了学校优势学科伦理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的力量，实现了学科的优势互补。这些教授都是博士，年轻有为，他们实际上都是以本学科为立点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如李伦教授41岁，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网络传播和网络伦理研究。现任国际学术杂志《信息、传播与社会伦理杂志》（*Journal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thics in Society) 编委,《国际信息技术伦理学会年鉴》(*Annual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主编助理,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计算机网络化进程中的伦理问题研究”(2000—2002年),发表相关论文10多篇,出版专著《鼠标下的德性》(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译著《黑客伦理与信息时代精神》(中信出版社,2002年)。邓名琰教授43岁,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媒介文化、传播伦理方面的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塑造传媒文化的灵魂:大众传播中的伦理问题研究”(2004—2006年),发表相关论文10多篇,出版专著《传播与伦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谢俊贵教授48岁,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传播社会学、信息社会学、传播学方法、公共关系学方面的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信息分化——社会信息化转型中的社会分化研究”(2002—2005年),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信息的富有与贫乏——当代中国信息分化问题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现代公共关系运作》(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还有陈宏平、郑庆君等教授,他们都只有40岁出头,都是哲学、社会学或语言学博士,都是从伦理学、社会学和符号学来研究传播学的。陈宏平的出版伦理研究,郑庆君对手机短信和民间“段子”的研究,应该说都有独到的学术境地。

这些教授与我院本部教授的整合,形成了明显的学科交叉优势,呈现了广阔的学术发展前景。我们的“传播与文化”、“传播与社会发展”、“编辑出版”的硕士培养方向,就体现出学术力量整合后学科“杂交”的明显的优化效应。这些教授给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授课,使学生对传播学、新闻学的理解有了新的提升,甚至有“耳目一新”之感。他们的加盟,壮大了我们学科的力量,使学科呈现出勃勃生机。

实际上,传播学与新闻学从诞生伊始就与社会学、伦理学和符号学等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美国最早从事大众传播研究的米德(Goerge Herbert Mead)、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杜威(John Dewey)和帕克(Robert Eara Park)就是4位社会学家。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就是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在受众研究中,拉扎斯菲尔德的

“社会关系论”体现了社会学与传播学之间的互动，而霍夫兰的“态度”研究，既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又是传播学传播效果研究的范畴。传播学研究中所运用的主要方法如抽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控制实验法也是社会学研究中最主要的方法。新闻、传播与伦理学关系也十分密切。20世纪20年代，新闻学教育在美国大学中站稳了脚跟，从事新闻教育的学者不少是新闻伦理学研究的佼佼者。比如伊利诺伊大学的劳伦斯·墨菲（Laurence Murphy）一直倡导新闻伦理教育。这期间出版了一些新闻伦理学的奠基之作，如 Nelson Crawford 的《新闻伦理学》（1924年），Leon Nelson Flint 的《报纸的良知》（1925年），Willion F. Gibbons 的《新闻伦理学：新闻工作者优良实践讨论》（1926年），Albert Henning 的《新闻伦理与实践》（1932年）等等。他们研究的主要是记者和消息本源、经济诱惑和利益冲突、新闻自由与责任、煽情新闻与保护隐私等问题。^①据施拉姆考察，在1937年至1957年这20年中，美国的新闻学研究呈现三种主要趋势，其中之一便是有关报业与社会的研究，他把报业与社会的关系、伦理道德、新闻自由等称为新闻学的古老话题。^②在符号学的研究领域，社会学和传播学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形成了天然的交叉和结合。自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建立“符号学”以来，米德及布罗默将符号学运用到社会学中，创立了社会学符号学；卡西尔及苏珊·朗格将符号学运用到美学中，创立了“符号学美学”；列维·斯特劳斯将符号学运用到文化人类学中，从而建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尤其是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结合趋势，使符号的意义显示了巨大的潜能。正因为如此，考察符号的社会性质对传播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米德和布罗默在社会学中进一步发展了符号理论并创立了符号互动主义。该理论认为社会是人与人的互动结构，人与人的群体构成人类思想、意识及行为的根本，社会交往中的媒介就是符号，创造符号是人类最基本的能力。在符号系统中，人类表达自身并通过符号为他人所接受，社会结构就建立在以符号为中介的互动关系中。因而，符号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无疑是十分密切的。我国新闻和传播研究中较普遍存在的一个很大的缺憾，就是从新闻研究新闻，从传播研究传播，视野褊狭，空间不大，难以深

① [美] 里昂·纳尔逊·弗林特《报纸的良知——新闻事业的原则和问题案例讲义》，萧严译，李育修、展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译序”。

② [美] 梅尔文·门彻《新闻报道与写作》，展江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前言”。

入,以致出现“无学”的尴尬局面。我院传播学研究在校内相近学科的整合符合资源共享的现代学术与教育的要求,符合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规律和研究趋势。事实上,我们的研究也由此呈现出较强的学术潜力,焕发出更具活力的学术生命力。

我院还有8名青年教师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等校攻读新闻传播学博士,明年就有5人学成归来。他们的研究也基本上是朝这一方向走的。

这次出版的丛书无疑是这一学术追求比较充分而集中的成果展现。“现代化”是这套丛书一个主要的价值视角。现代化的视角本身就是一种综合性视角。它是文化、社会发展、历史等视角的交叉整合。二战结束以后,许多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把现代化作为一种普遍的追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在这一历史现象刚出现时就敏锐地指出,“现代化”作为一种新价值观,成为了新兴的民族国家的知识阶层精英分子的理想和“官方信息”,几乎成为一种国教,是“新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现代化则更带有“特殊性”。中国既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农业文明的古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还是一个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蹂躏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既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所在、希望所在,也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艰难所在、坎坷所在;既体现中华伟大的民族精神,同时又体现她与时不适、亟待实行现代转换的文化基因。因而,在这个“背景”上研究“传播”这一社会的“神经系统”与社会主体前行的互动互应的规律,切中的应当是中国传播的最为本质性的问题;既是研究中国传播的现代化,也是研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既是研究传播的本土化,也是研究中国社会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中和西碰撞而融合的文化自新的过程和规律。“现代化”是丛书各文本个体之间的一个内在纽结。拙著以“历史决定着话语,话语演绎着历史”作为全书的总纲,既概括拙著的学术追求和学术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着丛书的学术追求和学术特色。除了“现代化”这个视角外,各文本个体还各有其独到的学术视角。比如拙著的“话语”视角,也是一种语言学、符号学的视角。在话语理论产生之前,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作为一种主导性的理论,支配着语言学的研究。索绪尔的语言学被称为结构主义语